

地方公共品供给与人口迁移^{*}

——来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杨义武 林万龙 张莉琴

【摘 要】文章利用工具变量和门限模型估计了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不同规模城市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与向大城市迁移相比,流动人口向中小城市迁移会更多地考虑公共服务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跨省迁移存在“门槛”效应,而对人口省内迁移表现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基础设施供给也对人口迁移具有积极作用。当社会福利供给水平低于一定“门槛”值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不明显,一旦越过“门槛”,对人口迁移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人口迁移 地方公共品供给 迁移结构 供给结构

【作 者】杨义武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林万龙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莉琴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一、研究背景

人口流动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一般认为,当不同区域和产业间存在比较收益差异,就会驱动人口流动。国内不少研究支持工资收入对劳动力流动的诱导效应(翁杰,2011),令人疑惑的是,尽管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步入增长快车道^①,但在工资快速上涨的同时,城市“民工荒”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一些研究开始将视角转向工资以外的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有研究显示,除了对工资等市场因素的考量外,人口迁移决策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函数。Tiebout 模型提出的“用脚投票”机制最早关注公共品供给与人口迁移效应(Tiebout,1956),此后该模型不断得到验证和拓展(Oates,1969;Giuranno等,2015)。近年来,关于 Tiebout 模型的经验研究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引起不少争论,一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一体化的新型城乡关系研究”(编号:15AZD020)的阶段性成果。

^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2015年,农民工工资月均收入增加1300元,年均增长12.7%,远超“十二五”期间GDP增幅。

些研究认为 Tiebout 模型不适用于中国(乔宝云等,2005),也有一些文献对“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适用性持肯定态度(马伟等,2012;汤韵、梁若冰,2009;夏怡然、陆铭,2015;方大春、杨义武,2013)。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机制可以归纳为以下 3 个方面:(1)较高的公共品供给水平能够提高厂商生产效率,进而提高地区平均工资水平,增加人口迁入的激励;(2)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提高有助于改善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对外来人口迁入形成正向冲击;(3)公共品供给需要相应财政资金支持,增加地区财税负担,从而降低本地区工资水平,对人口迁入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方向不确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2005 年之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由于户籍限制,外来劳动力无法享受与本地城镇居民相同的市民化待遇,不能获得均等公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但这种市民化不足的现象并不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很大影响,就业和工资仍是主导劳动力流向的重要因素。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释放,城镇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高龄劳动力因无法市民化返回农村。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显示,由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66.1%的农民工选择到一定年龄返乡(樊明等,2015)。另一方面,新生劳动力因公共服务不足限制进城意愿。新生劳动力就业心理发生较大变化,不再仅限于将务工视为个人或家庭的谋生手段,而是更注重在城市生活中营造美好前景。此外,当前城市生活的经济成本与压力成为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课题组,2014),而公共服务“兜底”可以在一定程度降低生活成本。为此,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开设农民工子弟学校、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社保体系、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举措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存在非均衡现象。一方面,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聚,大城市无法满足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需求,导致外来人口难以真正融入;另一方面,中小城市由于在就业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缺乏竞争优势,人力资本流失,城市发展缺乏活力。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关注到不同规模城市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Henderson等,2004;Albouy,2008;王小鲁等,2009),但并未直接将公共服务纳入研究框架。侯慧丽(2016)虽然考察超大、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如何影响人口流动,但侧重于从公民权的角度分析,主要考察养老保险和健康档案两类公共服务对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也有文献从社会服务性、政府行政性及文教卫支出(付文林,2007)或生产型和消费型公共支出(吴伟平、刘乃全,2016)等角度考察公共品供给结构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但从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等供给结构考察对人口迁移直接影响的文献较少。

公共品供给对省内和跨省人口迁移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一方面,省内和跨省迁移的成本不同,由于存在距离衰减效应,劳动力省内迁移成本(包括交通、心理、搜寻、风

险成本)相对较低(王国霞,2008)。另一方面,二者的收入和就业机会也存在差异。“六普”数据显示,相比省内迁移,跨省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较高且以经济活动为主。这种结构性差异导致其与地方公共服务作用机制不同。跨省迁移行为由于迁移成本高,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弥补,其较高的人力资本也增大了对迁入地公共服务的需求(马红旗、陈仲常,2012)。目前将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研究视角延伸至跨省和省内维度还不多见。张耀军、岑俏(2014)虽关注到此问题,发现公共资源对省内人口流入影响大于跨省流入,但模型分析忽视了公共品供给与跨省和省内人口迁移的内生性,且对公共资源测度也不够全面。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公共品供给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地方公共品总供给水平,借助门限模型考察公共品供给、人口迁移与城市规模之间关系,并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跨省和省内人口迁移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 指标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根据 2000 年五普的定义,人口迁移是指 5 岁及以上被调查者将户口由原居住地转到现居住地或者离开原居住地(户口所在地)6 个月及以上。2010 年的六普进一步将迁移人口的年龄由 5 岁及以上放宽至所有人口。显然,六普较五普统计“门槛”大大降低,若用五普和六普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会产生较大偏误。本文考察对象非微观迁移个体而是地区人口迁移存量,相对来说,六普数据是目前可获取的最新的的数据。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六普地级及以上城市截面数据展开分析。为保证数据时效性,本文稳健性检验部分还对 2013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迁移人口存量进行估算,并进行分析。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迁入人口相对比重采用迁入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之比衡量,同时,为进一步探索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结构的机制差异,分析中将总迁入人口相对比重分解为省内^①和跨省迁入人口相对比重。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对地方公共品及其两大类,即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表 1 地方公共品测度指标

基础设施	社会福利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平方米/人)	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册/人)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辆/万人)	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普通中小师生比*
住房内有管道自来水占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从业人员密度
市辖区城市建设用地占比(%)	
城市污水处理率(%)	

注:* 为逆向指标。

① 省内迁移是来自本县(市)、本市市区和本省其他县(市)、市区迁入人口之和。

予以测度。参照丁菊红、邓可斌(2011)等研究定义,具体测度指标选取如表1所示。

根据表1所列指标,本文依次进行指标的正向化、数据的标准化、正定矩阵检验、KMO和Bartlett检验、求解各特征值及对应的特征向量、最后计算出各主成分值。

3. 控制变量

本文重点控制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等变量。其中,就业率指标用各种职业的就业人口之和占16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地区实际人均GDP的对数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表示;私营经济发展用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地区总人口比重表示;工资收入指标用职工年实际工资的对数表示;此外,为检验不同区域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影响的差异,本研究以中部地区为对照组,构建地区虚拟变量与公共品供给交互项纳入模型。

(二)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市级党委书记数据库(2000~2010)》。由于部分城市数据缺失值较为严重或存在异常值,本研究最终选取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对于个别城市数据存在的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齐。

(三) 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考察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据此,构建基准计量模型为:

$$migration_i = \beta_0 + \beta_1 public_i + \beta_2 X_i' + \eta_i \quad (1)$$

其中, β_0 为常数项, β_1 、 β_2 为待估参数, η_i 为随机扰动项, X_i' 为一组控制变量向量。本文内生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公共品供给与人口迁移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即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会影响人口迁移的方向和数量,而城市迁入人口增加扩大了地方公共服务需求,迫使地方提升公共品供给水平。(2)变量遗漏偏误,尽管已经控制一些重要变量,但依然遗漏一些重要的影响人口迁移的变量,如户籍制度、迁移距离等,造成估计偏差。为克服上述问题,本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①。

城市规模一般与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对称,规模越大,公共品供给水平越高。本文以总公共品供给变量为门限变量,构建门限模型分析不同规模城市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设定“单门限效应”模型,具体的门限模型设定为:

$$Migration_i = \alpha_{11} public_i (thd_i \leq M) + \alpha_{12} public_i (thd_i > M) + \et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2)$$

其中, $thd_i = public$ 为门限变量, M 表示门限值, α_{11} 、 α_{12} 为门限区间估计参数。

① 选用地级及以上城市时任党委书记受教育水平;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人员数量;公共管理、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数量;财政分权程度作为工具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影响

表 3 中模型 1 为地方公共品供给与人口迁移 OLS 估计。模型 2 为控制区域虚拟变量与公共品供给的交互项,以检验人口迁移区域异质性。模型 3 为使用工具变量的 2SLS 估计。模型 4 采用迁移人口比重对公共品供给加权平

均,进而依据平均值进行分样本估计。模型 5 采用门限广义矩估计。所有检验表明工具变量有效,模型结论可靠。

模型 1 至模型 3 的估计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显著为正,完善的公共服务增加人口迁入的激励。Tiebout 模型提出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得到验证。这与 2000 年“五普”的状况相比发生明显改变。汤韵、梁若冰(2009)曾利用 2000 年“五普”数据研究发现地方公共支出差异对居民迁移作用不显著,主要由于 2000 年之前户籍管制较严,迁移人口难以在流入地获得户籍,进而无法享受当地公共服务,收入成为迁移的主导因素。本文基于“六普”数据研究发现,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的放宽和物质成本削弱,公共服务在人口迁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开始显现。

表 3 结果显示,工资收入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工资收入是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动因;就业率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迁入人口以农民工群体为主,他们多数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很难在正规部门获取就业机会,而就业率恰恰是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情况为统计对象,二者之间关系较弱;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口迁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第三产业比重越高,就业机会越多;私营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显著为正,私营经济发展不仅反映地区创新和创业环境,且对加快市场化进程、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对人口迁入有积极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变量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业机会越多,公共服务越完善,迁入人口增加;此外,区域虚拟变量与公共品供给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不同区域公共品供给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均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全样本	34 个大中城市	69 个大中城市			
人口迁移	0.199	0.449	0.322	0.186	0.035	1.209
省际人口迁移	0.057	0.155	0.109	0.117	0.001	0.883
省内人口迁移	0.142	0.294	0.212	0.092	0.031	0.634
总公共品供给	-0.028	0.850	0.384	0.626	-1.200	2.370
社会福利供给	-0.026	1.015	0.439	0.731	-1.560	3.240
基础设施供给	-0.019	0.407	0.217	0.632	-1.820	1.540
工资收入对数	10.326	10.588	10.451	0.228	9.534	11.183
就业率	0.677	0.616	0.653	0.061	0.493	0.821
经济发展水平	9.133	9.663	9.413	0.549	7.894	10.737
产业结构	0.754	1.157	0.983	0.385	0.109	3.129
私营经济发展	0.343	0.296	0.351	0.273	0.014	2.402

注:本文采用 34 个和 69 个大中城市样本,而非国家统计局常用的 35 个和 70 个,东莞市因存在异常值被剔除。

表 3 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估计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OLS	OLS	2SLS	2SLS		门限(GMM)	
				q≤0.48	q>0.48	q≤0.89	q>0.89
工资收入	0.222*** (4.73)	0.186*** (3.71)	0.173*** (3.02)	0.162*** (2.95)	0.212 (1.56)	0.021* (1.66)	0.063* (1.70)
就业率	0.070 (0.52)	-0.022 (-0.15)	0.166 (1.09)	0.147 (0.71)	-0.149 (-0.33)	-0.136 (-0.82)	1.099 (1.56)
经济发展水平	0.059** (2.47)	0.077*** (3.04)	0.002 (0.04)	-0.005 (-0.07)	0.084 (1.06)	0.003 (0.08)	-0.152 (-1.07)
产业结构	0.096*** (4.56)	0.094*** (4.33)	0.074*** (2.83)	0.042* (1.72)	0.133** (2.32)	0.059** (2.27)	0.062 (0.52)
私营经济发展	0.049* (1.75)	0.058** (2.02)	0.032 (1.02)	0.010 (0.27)	0.297** (2.17)	0.005 (0.25)	0.389** (2.16)
公共品	0.104*** (4.95)	0.058* (1.87)	0.189*** (3.17)	0.205* (1.69)	0.150 (1.15)	0.193*** (3.71)	0.034* (1.71)
西部虚拟变量×公共品		0.034 (0.92)					
西部虚拟变量		0.043* (1.76)					
东部虚拟变量×公共品		0.073** (2.30)					
东部虚拟变量		0.001 (0.05)					
常数项	-2.767*** (-5.93)	-2.505*** (-4.95)	-1.780** (-2.21)	-1.552* (-1.75)	-2.928 (-1.38)		
样本量	260	260	260	209	51	260	
r ² _a	0.58	0.58	0.55	0.26	0.54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由于篇幅所限，表中未列出内生性和工具变量识别检验结果。

对人口迁移影响存在差异，与中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入的影响更大。

模型 5 估计结果显示，当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低于 0.89 时(以 2010 年为基准，包括 260 个地级市中的 240 个城市)，地方公共品供给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系数值为 0.193；当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高于 0.89 时(20 个城市)，估计值下降至 0.034，但依然显著。由此表明，不同规模城市公共品供给水平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大城市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入的影响低于中小城市。一方面，由于城市规模扩大带来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公共品运营和治理成本随之增加，加重地方财政负担，从而需要通过税收、土地财政等形式转嫁。大城市公共品供给水平较高，地区生产效率和工资收入也高，但政

府转嫁的税赋相应较重,生活成本和压力较大,使公共服务对人口迁入的积极影响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一些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供给都依附于户籍,尽管近些年户籍改革不断深化,但大城市户籍管制依然比中小城市严格,致使大城市公共品对人口吸纳能力不及中小城市。模型 5 结果还表明,不同规模城市(公共品供给水平是否高于 0.89)的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同样存在差异。大城市的工资收入、产业结构、私营经济发展等经济因素对人口迁入的影响明显强于中小城市。综合公共品供给和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影响的差异可以发现,人口往大城市迁移可能更多考虑经济因素,而流向中小城市可能追求舒适的生活和公共服务。但这既不意味着地方公共品供给会决定人口流向,也不表明增加中小城市公共品供给会改变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劳动力流动决策是工资和公共服务等城市特征共同作用结果,同时,也难以有效分离出工资和公共服务二者的作用力,毕竟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也会通过提升地区生产效率、增加地区工资收入的途径吸纳劳动力。

(二) 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结构的影响

人口迁移在空间结构上又可进一步分解为跨省和省内迁移。通过地方公共品供给与跨省和省内迁移人口相对比重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地方公共品供给与跨省迁移存在非线性关系(见图 1),与省内迁移为简单线性关系(见图 2)。据此,分别构建计量模型展开进一步分析。

表 4 给出了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跨省和省内迁移估计结果。模型 6、模型 7 表明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跨省迁移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模型 8 至模型 10 估计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省内迁移有显著正向影响。地方公共品供给对跨省和省内迁移作用差异可能是迁移成本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造成的。

控制变量中,与前文全样本估计结果类似,工资收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变量对跨省和省内人口迁移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率、私营经济发展水平对跨省和省内迁移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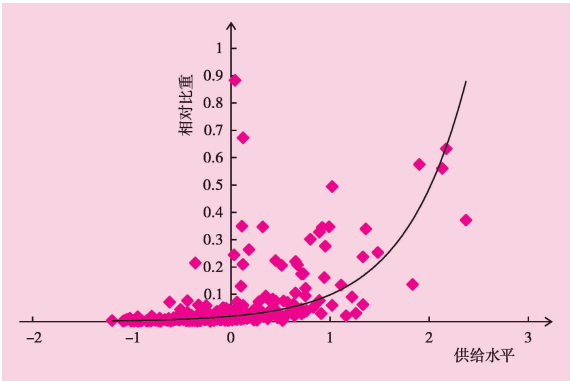


图 1 地方公共品供给与跨省迁移人口
相对比重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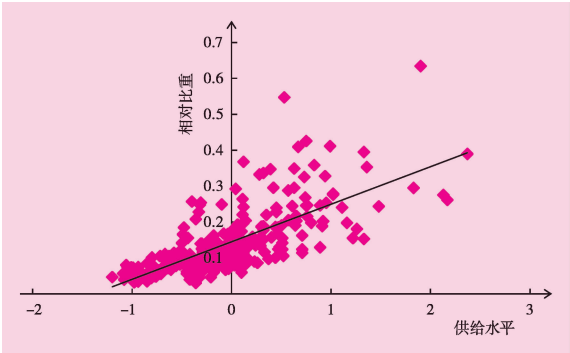


图 2 地方公共品供给与省内迁移人口
相对比重散点图

表 4 地方公共品供给对跨省和省内人口迁移的估计(N=260)

	跨省迁移		省内迁移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OLS)	(OLS)	(OLS)	(OLS)	(2SLS)
工资收入		0.120*** (3.53)	0.071*** (3.13)	0.074*** (3.30)	0.069*** (2.61)
就业率		0.300*** (3.02)	-0.311*** (-2.69)	-0.305* (-1.68)	-0.296 (-1.59)
经济发展水平		0.039** (2.25)	0.034*** (2.95)	0.033*** (2.91)	0.028* (1.65)
产业结构		0.047*** (3.05)	0.034*** (3.32)	0.035*** (3.52)	0.033*** (2.76)
私营经济发展		0.060*** (2.93)	-0.000 (-0.00)	-0.001 (-0.06)	-0.002 (-0.16)
公共品	0.779*** (7.49)	0.031* (1.94)	0.047*** (4.38)	0.049*** (4.88)	0.057** (2.05)
公共品平方项	0.049*** (5.30)	0.040*** (4.26)	0.003 (0.53)		
常数项	0.039*** (5.73)	-1.819*** (-5.40)	-0.726*** (-3.22)	-0.743*** (-3.34)	-0.655* (-1.76)
r ² _a	0.39	0.46	0.60	0.60	0.61

注:同表 3。

分解为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模型 11 至模型 13 为社会福利估计,其中,模型 11、模型 12 为线性模型,模型 13 为门限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未达到 -0.579 时,对人口迁入影响不显著,当跨越 -0.579 门限值时,对人口迁入影响显著为正。这可能是由于 GDP“锦标赛”导致地方社会福利供给不足,同时,为防止消费人数增加降低本地居民消费收益,社会福利供给容易与户籍挂钩,供给的外溢效应有限,因此,当地方社会福利供给尚未达到门限值时,对人口迁入没有显著影响,只有社会福利供给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对外来人口迁入构成积极吸纳效应。

模型 14、模型 15 为基础设施估计。模型 15 估计结果显示,基础设施供给对人口迁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方面归咎于分权和 GDP“锦标赛”双重体制下,地方政府热衷于基础设施供给,导致基础设施供给充足;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具有更为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吸纳外来就业人口。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 2013 年全国地级市统计年鉴数据进行稳健性

存在差异,对跨省人口迁移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意味着就业机会和私营经济发展环境是吸纳跨省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而对省内人口迁移的影响不显著,按照王国霞(2008)的研究,移民存量对省内人口迁移决策起决定性作用,因此省内迁移决策受就业机会和私营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小。

(三) 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为了明确不同公共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本研究将总公共品

检验。但囿于数据可得性,人口迁移和其他变量的选取和测度指标与前文有所差异,人口迁移变量为净迁入人口与当年常住人口之比,其中,净迁入人口根据人口的净增长减去人口自然增长估算(傅勇、张晏,2007)。公共品供给水平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①。控制变量包括职工平均工资对数、产业结构、失业率、人均GDP 指数(上年=

100)等。工具变量包括地方财政分权和上一年地级市市长的受教育水平。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模型 16 为全国样本的门限估计,以检验不同城市规模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影响差异,模型 17 为社会福利供给门限估计,模型 18 为基础设施供给估计。可以发现,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分析基本一致,仅模型估计的系数及门限大小略有差异。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2010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和门限模型分析了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不同规模城市影响强度不同,中小城市公共品供给对人口吸纳效应强于大城市,

① 公共品供给变量包括:人均铺装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数量,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中小师生比,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单位从业人员密度,其中,前 5 个指标为基础设施,后 4 个指标为社会福利。

表 5 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社会福利供给				基础设施供给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门限)		模型 14	模型 15
	(OLS)	(2SLS)	q≤-0.579	q>-0.579	(OLS)	(2SLS)
工资收入	0.229*** (4.96)	0.213*** (4.28)	0.769* (1.65)	0.157*** (4.91)	0.287*** (6.03)	0.306*** (5.82)
就业率	0.161 (1.15)	0.227 (1.43)	0.411 (0.80)	0.059 (0.34)	-0.020 (-0.14)	0.089 (0.48)
经济发展水平	0.096*** (4.72)	0.085*** (3.57)	-0.051 (-0.86)	0.145*** (4.53)	0.142*** (6.23)	0.188*** (3.56)
产业结构	0.097*** (4.62)	0.088*** (3.82)	0.022 (0.51)	0.107*** (5.63)	0.124*** (5.84)	0.125*** (5.74)
私营经济发展	0.078*** (2.81)	0.081*** (2.90)	0.085 (1.39)	0.086** (2.21)	0.079*** (2.63)	0.111** (2.47)
社会福利	0.073*** (5.11)	0.096*** (3.16)	0.118 (1.51)	0.074** (2.47)		
基础设施					0.018 (1.08)	0.087* (1.68)
常数项	-3.253*** (-7.75)	-3.023*** (-6.10)	-7.539* (-1.65)	-2.905*** (-7.73)	-4.165*** (-9.34)	-4.871*** (-5.65)
N	260	260	51	209	260	260
r ² _a	0.58	0.57	0.64		0.54	0.51

注:同表 3。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全样本(门限)		社会福利(门限)		基础设施
	q≤0.794	q>0.794	q≤0.199	q>0.199	2SLS
公共品	0.001 (1.00)	0.016** (2.00)			
产业结构	0.079 (1.46)	-0.239*** (-7.47)	0.078 (1.39)	0.446*** (7.84)	0.016* (1.68)
失业率	0.005 (0.50)	-0.078*** (-5.20)	0.001 (0.70)	-0.069*** (-7.67)	-0.005 (-1.10)
工资收入	0.024* (1.72)	0.101*** (3.37)	0.023 (1.01)	0.063*** (2.10)	0.003** (2.63)
人均 GDP 指数	0.000 (0.91)	0.037*** (10.12)	0.000 (0.25)	-0.017 (-0.63)	0.002 (1.12)
社会福利			0.002 (1.44)	0.009*** (3.52)	
基础设施					0.060* (1.85)
常数项	-0.295 (-1.23)	3.720*** (7.46)	-0.288 (-1.00)	2.988*** (4.40)	0.109 (0.30)
N	245	22	176	100	267
r ² _a	0.26		0.27		0.14

注:同表3。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包含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迁入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提升城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让迁入人口真正享受市民的各项待遇,让更多的人“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2)在推进各项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合理配置不同规模城市公共资源,改革按城镇级别配置公共资源的方式,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通过公共财政、金融支持和制度创新等举措,给予中小城市更多公共资源配置,缩小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引导人口合理流动。(3)针对需要吸纳跨省迁入人口的城市来说,除增加当地就业机会、降低阻碍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制度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外,应更加重视本地公共品供给水平建设,一方面更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可以提升企业生产率,提高本地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更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可以弥补跨省迁移的高成本,从而实现“促增收”与“降成本”双驱动,提升集聚能力。(4)明确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不同类型公共品供给的承担主体,在财政能力约束体制下,中央应更多地承担教育服务、医疗等社会福利公共品供给责任,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负担。在现有财政分权体制下,弱化对地方政府唯GDP增长政绩考核指标,将关乎民生福祉的社会福利供给能力纳入考核指标,通过财

而经济因素对人口吸纳效应则小于大城市。从人口迁移结构的角度来看,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跨省迁移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对人口省内迁移具有明显线性关系且效应为正;从公共品供给结构来看,基础设施供给对人口迁入有正向影响,而社会福利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同样存在“门槛”效应,当地方社会福利供给未达到门限值时,对人口迁入影响不显著,而当超过门限值时则对人口迁入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

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社会福利供给,尽早跨越社会福利供给的“门槛”值,增强对外来人口的吸纳效应。

参考文献:

1. 丁菊红、邓可斌(2011):《财政分权、软公共品供给与户籍管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2. 樊明等(2015):《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处境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方大春、杨义武(2013):《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财经科学》,第8期。
4. 付文林(2007):《人口流动的结构性障碍:基于公共支出竞争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第12期。
5. 傅勇、张晏(2007):《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第3期。
6. 侯慧丽(2016):《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差异及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7. 马红旗、陈仲常(2012):《我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特征——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口研究》,第5期。
8. 马伟等(2012):《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人口迁移: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中国软科学》,第3期。
9. 乔宝云等(2005):《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10. 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课题组(2014):《如何让农民工真正“进城”》,《光明日报》,第6期。
11. 汤韵、梁若冰(2009):《中国省际居民迁移与地方公共支出——基于引力模型的经验研究》,《财经研究》,第1期。
12. 王国霞(2008):《中国农村人口省际省内迁移机制研究》,《经济管理》,第8期。
13. 王小鲁等(2009):《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第1期。
14. 翁杰(2011):《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15. 吴伟平、刘乃全(2016):《异质性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门槛效应: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财贸经济》,第3期。
16. 夏怡然、陆铭(2015):《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17. 张耀军、岑俏(2014):《中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与省际流动影响因素研究》,《人口研究》,第5期。
18. Albouy, David. (2008), Are Big Cities Really Bad Places to Live? Improving Quality-of-Life Estimates across Cit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14472.
19. Giuranno, Michele, Biswas, Rongili (2015), Internal Migration and Public Policy, POLIS Working Papers, No. 228.
20. Henderson, J. Vernon, Jacques-Francois Thsse (2004),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Cities and Geography. 4(1).
21. Oates, W.E. (1969), The Effects of Property Taxes and Local Public Spending on Property Valu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x Capitalization and the Tiebout Hypothe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7(6):957-971.
22. Tiebout, C.M. (1956),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5):416-424.

(责任编辑:李玉柱)